

愿在他乡做读者

何勇回忆录

何勇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何勇回忆录

何勇 著

134
在他乡做读者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愿在他乡做使者：何勇回忆录/何勇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 8

ISBN 978-7-305-20514-9

I. ①愿… II. ①何… III. ①何勇—回忆录 IV.
①K825. 4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47682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出 版 人 金鑫荣

书 名 愿在他乡做使者——何勇回忆录
著 者 何 勇
责任编辑 沈卫娟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80 1/32 印张7.25 字数166千
版 次 2018年8月第1版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20514-9
定 价 50.00元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 83594756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录

风雨六十年	001
中文与联合国	099
联合国的中文教学	117
联合国赴华汉语培训项目	129
两次获联合国21世纪奖	145
联合国里的中文活动	153
书法在联合国	167
华美人文学会	175
人生再出发	201
后记	219

风雨六十年

我的人生犹如蜿蜒不定的河流，
没有成型的航道，
没有既定的目标，
顺流随遇，左奔右突，
在茫茫的人生大地上刻画出了
自己未曾期许的印记。

我的人生犹如蜿蜒不定的河流，没有成型的航道，没有既定的目标，顺流随遇，左奔右突，在茫茫的人生大地上刻画出了自己未曾期许的印记。

回顾往事，幼时我从未想过与英语结缘，也从未想过若干年后自己远渡重洋，来到美国求学、生活、工作，更不敢想象自己进入联合国工作，在世界的彼端为推广中文和中国文化构建桥梁。

我的工作始终都在与语言打交道：从不识英文的童稚少年，到初学英文，到成为英文老师，再到留学美国；毕业后在美国大学教中文，接着在纽约华美协进社管理中文项目，再后来进入联合国工作，继续从事中文教学项目。

我至今的生活历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除了第二段历经十七年，其他三段都是整整十五年。每个阶段的突兀转折，看似出人意外，实则合情合理，好多个因缘际会最终使我走到了今天。如今回首前尘，仿佛又让我回到那些艰难却又温馨、繁累却又丰富、辛苦却又美丽的日子。

童学少年：1954—1969

坐标：南京

1954年12月24日，我在南京出生。南京的冬天不常下雪，但那一年的冬天出奇的冷，寒风萧瑟，雪花飘飘。我后来在网上查过，南京近百年来最低气温出现在1955年1月6日，达零下14度，正是我出生的那个冬天。

因为那年的雪特别大，父母就给我起名为“冬冬”——意为两个冬天。这个名字一直使用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才改为现在的名字。

12月24日是西方的平安夜，也就是圣诞节前夜。不过在当时那个与外界隔绝、惧谈西方的年代里，没有人会把我的生日与平安夜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我出国后，美国人一听到我的生日马上就会说：“Christmas Eve！”（平安夜！）而我通常的回答



父母

是：“It’s a day nobody cares about.”（无人在意的一天。）——因为人们都在期盼第二天的圣诞节。在我的记忆中，小时候父母从没有给我过过生日，我也没有参加过哪个小朋友的生日聚会。在我们小时候，大家好像都没有“过生日”的习惯。

我出生时，父母住在南京市太平南路的“东白菜园”。听起来好像是乡村，其实那儿距民国时期的总统府以及蒋介石、宋美龄宴请国宾的中央饭店仅咫尺之遥。此地历史上曾是一片白菜园，后成为东西两条巷子。东白菜园和西白菜园均是一栋栋民国风格的小洋房，我们家就在临街的一栋小洋房的二楼。

我家在二楼有两个房间，还有楼梯旁一间与邻居共用的小厨房，室外还有一个阳台，也是跟邻居合用的。在当时的南京，这已是很好的居住条件了。我家能享有这样的条件，原因是我父母均为国家干部，且级别还不低——父亲当时是南京市共青团宣传部长，母亲是我们家所在街道的办事处主任。

我最初的记忆是从全托幼儿园开始的。幼儿园其实就在我家门口，但那时正值“大跃进”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展开之际，父母全身心地投入，根本没有时间顾及自家的几个孩子。

我有两个妹妹，我们兄妹三人的年龄很接近，都在全托幼儿园住读。所谓全托就是寄宿制幼儿园，每周只有星期天可以回家。我记得幼时的我在幼儿园思家心切，每天都盯着那扇锁着的大门，希望妈妈会突然出现。最难熬的便是夜晚了，瞅着凸凸凹凹的天花板，总是难以入睡。记得有几次，我瞅着幼儿园的“阿姨”没注意，偷跑回家，就像从监狱越狱逃跑一样。好在那时没有门卫把守，社会上也没有治安问题。每次偷跑回家，都被妈妈又送了回去。后来大概妈妈也心疼了吧，就决定不再让我上全托，而改为日托了，这样每天傍晚我就可以回家了。

“大跃进”过后没多久，三年困难时期（1959—1961年）就接踵而至。全民饥馑，物资匮乏。根据中央决议实行完全供给制，全国创办公共食堂，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人人都吃食堂。可是食堂早上只有稀饭，中午和晚上每人只有一碗米饭，是装在一个陶瓷碗里的蒸饭，大人小孩都一样。长大后听我母亲说大人为了让孩子吃饱，自己常常忍饥挨饿，少吃或者不吃。后来我父亲还得了浮肿病，就是因为把饭菜省给孩子吃，长期忍饥挨饿。

那时我已经上小学了。我们家附近有个南京市很有名的菜场，叫科巷菜场。记得每天下午都有卡车运菜进来，车一卸货就有很多人蜂拥而上，抢吃青菜的菜心。我常常跟着小伙伴们一起去吃，主要是为了好玩儿。菜心甜甜的，倒也蛮好吃。

当时城市里的情况还好一些，农村就更糟糕了。很多农村人在农村没有吃食，便来城里行乞要饭，治安也成了问题。记得有一次，我跟母亲去鼓楼的食品大楼买了一包“油球”（用油炸的面团，里面有些糖）。我拿着那个装有“油球”的纸包，转眼间就有个人从我手里抢走，飞奔而逝，让我着实惊吓不已。多年后我跟太太聊起过此事，她说她小时候也有类似的遭遇，被抢过一个馒头。那个抢馒头的人一把夺过馒头，并在馒头上连吐几口唾沫，然后边跑边啃，吓得她大哭。因为饥饿，有些人已经失去理智而抢夺食物。

父母堂尊

我该说说我的父母了。他们来自完全不同的家庭。

先说我母亲吧。她叫黄贤，1928年出生在北京的一个普通家庭，起初家境还凑合。她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曾在皇宫做杂事。姥爷有些文化，算是个文人，能算会写，平时给人写字

做账，但并非固定的工作，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母亲4岁时，家中有5口人：我的太姥姥、姥姥、姥爷、母亲，以及我一个年幼的舅舅。由于那时家中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我太姥姥就决定下关东去讨生计，于是带着全家一起去了长春。因当时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和一帮清朝遗老都在长春，太姥姥觉得那儿兴许能联系到太姥爷当年在皇宫里的一些关系，给姥爷介绍个工作。但是到了长春才发现，这些人并不能帮上什么忙。

那时哈尔滨有个公司来长春，声称招有文化的人当会计，姥爷报名就跟着他们走了，后来才知道是被骗。那些被招的人都被送去黑龙江铁力县的深山老林做劳工，伐木砍树。姥爷是文人，不擅体力活，加之随身携带的衣服不多，没多久就活生生地被冻死在林子中。

留在长春的一家人，靠太姥姥在长春头道沟为一个叫“北平站”的客栈做事养家。“北平站”的老板和伙计都是北京人，太姥姥就在那儿给人洗衣服，做针线活，一天赚几毛钱。我的姥姥身体不好，但为了维持生计，她去日本人办的宝山火柴厂做工，早上5点多就得出门。外面冰天雪地，她常常在冰上跌倒，摔得头破血流。在我母亲8岁的时候，我的姥姥就去世了。

太姥姥随后携我母亲和舅舅去了四平。太姥姥给人家做保姆，我母亲在一所免费的天主教小学上学。三四年后祖孙三人又回到长春北平站。

母亲在12岁时，经姥姥朋友的介绍，也进了宝山火柴厂做工。她小小的年龄，每天从早上5点半工作到晚上5点半，整整12个小时。

1947年年底，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前夕，中共地下党进厂宣传，母亲就加入了党组织，到长春外围做妇女工作，做军

鞋、组织担架队。1948年10月长春解放，母亲担负妇救会工作，其后跟随组织去沈阳。11月沈阳解放后，她又继续随组织南下；先到上海，后因语言不通，由组织分配到南京，任南京市总工会女工部科长、党政工团科长。

1955年南京市建立街道办事处机制，我母亲到五老村办事处担任主任，数年后转任书记，在此职位上一直工作到20世纪80年代末退休。

我家所在的街道叫五老村，我入读的小学叫五老村小学。

五老村原是一个不起眼的街道，后来因为卫生环境搞得好而名扬全国，成为样板。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人也许记得毛泽东主席的一段题词——“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据说这就是为五老村题写的。

1960年12月21日，周恩来总理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五老村参观，就是我母亲和当时办事处的书记负责接待解说的。

周总理看到原来的臭水坑变成美丽的小花园，对五老村的卫生面貌、优美环境表示赞赏。客人一行参观了五老村幼儿园、五老村小



母亲

学和街道的食堂，我还为周总理献花。周总理和西哈努克亲王的这次来访，成为五老村一段引以为荣的历史，传为美谈。

与我母亲相比，我父亲小时候没受过什么苦。他1929年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富裕家庭里。按照1949年后划分阶级成分，他家属于地主兼资本家。

父亲有兄弟姐妹十人，他排行老二，在家时佣人们都称他为“二少爷”。我父亲从小聪颖过人，弟妹们对他都十分崇敬。父亲在高邮读完小学和初中，随后上了江苏名校——扬州高中，今天说来，就是一所省级重点中学。

1945年父亲16岁时从扬州高中毕业，报考南开大学，被化学系录取。父亲其实对理工科不感兴趣，他喜欢的是文科，特别是外国语言与文学。在南开待了一年，他决定放弃理科而改学文科，于是报考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并以优异的成绩得偿所愿。大学问家朱光潜、李赋宁等语言文学大师都是他的老师。



父亲

以父亲的家庭背景，他本应该潜心读书，学成后回乡继承家业。但就在这时，情况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他在学校里接触到进步人士和新思想，被发展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从而走上了与自己的家庭背景完全相反的道路。

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父亲就随饶漱石南下至南京，担任南京市共青团宣传部长、团市委团校校长。1956年参加

筹办《南京日报》，之后担任《南京日报》办公室主任兼编辑部主任。1963年，《南京日报》因经费拮据停办，他随后转去南京市第四中学当校长，直至“文革”爆发。

青葱岁月

我六年的小学生活，前三年是自然灾害，后三年是“四清”“文革”等政治运动。大人们因为紧张的政治气氛和艰难的生存环境而忧心忡忡，但小孩子们则因年幼而无忧无虑，当然更不知道为父母分担忧愁。所以，至今我对小学的记忆都是充满着欢乐、自由和探险的。

1966年，正值我小学临近毕业时，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一夜间天翻地覆，好人变成了坏人，尊敬的领导和老师们都成了牛鬼蛇神。每天在大街上处处都能看到佩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铺天盖地满满贴的都是大字报。

我的父母白天都不在家，有时甚至晚上也不在家。他们都受到运动冲击：母亲被批、父亲被打、红卫兵抄家……

现在想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作为孩子理应是很害怕的，可当时似乎也就麻木了。环顾周围，每家每户均遇到类似的困境，我们这些受冲击的家庭以及被殃及的子女，都不知道父母以后会怎样，更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首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宋彬彬给他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毛问她叫什么名字，她回答说“宋彬彬”，毛觉得不好，说“要武嘛！”宋彬彬马上改名为“宋要武”。此事一见报，一夜间全国数百万年轻人都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带有革命色彩的名字，如“志武”“红武”“卫东”“保华”，等等。我也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何勇”。

经过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全民闹“文革”的一段混乱时期后，1967年10月14日，“文革”中又号召“复课闹革命”，我被分到南京第十五中学读初中。入校后虽然开课，但没人有心思学习。我现在还记得，那时老师们在讲台前讲课，学生们背对而坐，有的说话，有的做别的事儿，老师也不敢管。

1968年12月，毛泽东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此66、67、68三届在校的初、高中学生，几乎全部发往农村。我那一届初中毕业生本该留城，分配到工厂工作而不必下乡的，但因为我的父母，我也下乡了。

那是1969年，南京市发动干部“下放”到农村去。也不知道是我父母主动请求，还是因为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下放，我和两个妹妹也就跟着父母下放了。

父亲当时的思想很单纯，想法也很幼稚。在他看来，由于他的出身不好，他的父辈曾经剥削过穷人，他就应该到最艰苦的地



我（前排右）与初中同学，南京，1975年。

方去接受改造才能脱胎换骨，才能与家庭彻底划清界线。母亲多年后曾流露出歉意，觉得自己下放不该把我也带下去，乃至连累我吃了七年的冤枉苦。不知怎的，我后来从未向父亲提及此事，恐怕是怕让他老人家伤感吧。

当时南京干部的下放去向是两个地方：江苏北部淮阴专区的灌云和宿迁。我们家下放所在地是宿迁。

我还记得我们是坐一辆有顶棚的大卡车离开南京的。当时同行的下放车队足足有几十辆卡车。车上的人和送行的人哭成一片，直似生离死别，好不凄惨。不过我们这一车倒是没人哭，毕竟全家人在一起。

1969年在南京流传着一首《南京知青之歌》，歌词是这样的：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跨长江，雄伟的钟山脚下是我可爱的家乡。

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告别了你呀，亲爱的姑娘，揩干了你的泪水，洗掉心中忧愁，洗掉悲伤。啊，心中的人儿告别去远方，离开了家乡，爱情的星辰永远放射光芒……

车轮转动时，我想着的就是这首歌。

展翅奋飞：1969—1986

坐标：苏北

竹篱茅舍

下放农村，自然是要下到最底层的。农村的建制以县为单位，下属若干公社，公社下有若干大队，大队下分若干小队。政府在农村的最基层机构是公社，相当于城市里的街道。很多年以后，我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人类学，研究中国的社会结构时才了解到：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政府机构只设置到县一级，县政府就是县衙门，县长就是县太爷；而在农村，当代中国的政府机构则深入到公社一级，公社在1980年代初改为乡。

干部下放与知青下放不同。知青下放就完全成了农民，平时没有任何收入，要等到年底，地里的粮食上交给公社以后，根据一年中劳动所挣的工分才有一些现金分红。而干部下放后还是国家干部，每个月依旧拿原来的工资。

从南京出发，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颠簸，卡车终于把我们送到了宿迁。我们家被分到宿迁县洋北公社导淮大队的百家庄小队落户。

公社名叫“洋北”，是因为地处名扬四方的“洋河酒厂”北边；大队叫“导淮”，是因为京杭大运河就从大队部旁流过。附近还有一个控制水位的船闸，南来北往的船只都要在这儿停泊，岸上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熙熙攘攘的农贸集市。

由于我父母是国家干部，我也尚未达到“知识青年”的年龄（18岁），所以到了农村后我还要继续上高中。农村的高中很少，当时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位于公社驻地的高中（全公社只

有一所高中），另一个则是去相邻洋河公社的洋河中学。这两个高中离我们家都有十多里路，洋河公社还非宿迁县所属，而归临近的泗阳县管辖。

和父母权衡再三，决定去洋河中学入读。因为那是所名校，师资力量较强，规模也大一些。联系学校他们也愿意接受，所以下乡没多久，我就成了洋河中学的学生。

在洋河中学，我一开始时是住校，后来因为学校伙食不好改为走读，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十几里的土路往往要骑一个多小时，天气好的时候还能凑合，一下雨，很多路段就成了粘土泥浆，必须扛着自行车在泥浆中跋涉，苦不堪言。

到1972年，三年的高中生活终于结束，我也满了18岁。毕业后的唯一去向就是作为回乡青年，回到村里务农。

对于我们这些自幼在城市长大的孩子来说，做农活还是非常艰苦的。夏天要顶着烈日到田里插秧种水稻，我记得当时后背常常被晒得脱皮，回家后睡觉都不能碰席子。冬天虽是农闲，可还是要出工修水利。所谓修水利就是挖土、筑堤、打堆，也是很重的体力活，还记得我回家以后唯一想做的就是倒头大睡。

冬天下雨下雪的时候倒是不用出工。庄里的农民大多是串门聊天、自娱自乐。我那时非常消沉，茫然地看不到任何前途或出路，唯一希望的就是能有个机会脱离繁重的体力劳动。到大队所在地的商店里当个会计，或者到大队的机房当个机工，只要是非体力劳动的工作便是理想的出路。

百无聊赖之下，我翻起家中父亲从南京带来的一批英语教材和故事书。我当时对英文是大字不识一个，但书里精美的插图却非常吸引人，由此我就萌生了学英语的念头。